

上海市民生活方式的变迁

来源：《上海改革开放三十年研究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生活方式，是指在特定生产方式和一定价值观念支配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行为过程。[1]生活方式的变迁，在内容上主要是指生活需要、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实践活动等方面的变化，它涉及到物质消费、家庭生活、闲暇生活、社会交往等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具体表现。进入新时期，上海着力推动社会变革，通过夯实生活方式变迁的物质基础，营造生活方式变迁的居住和生活条件，有力地推动了上海市民消费行为的转型，完成了由温饱向小康到富裕的历史性跨越。

一、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

衡量人民生活状况如何，有众多的指标。其中，恩格尔系数，通过一个家庭全部支出中饮食费用所占的比例来衡量生活的质量的指数，无疑是这些指标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了。[2]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反映的是随着上海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历史过程。

改革开放后，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人均食物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1980年为310元，占56.05%。之后逐年缓慢下降，到1995年为3131元，占53.35%。15年间，其比例变化不大，都要占据开支的一半以上。但是，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这个时期上海城市居民家庭的生活正由温饱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迈进。这从食物性支出的内涵与质量也可见一斑。它发生了“两降”、“八升”的变化。

“两降”是指食物性支出中的粮食（主食）消费和蔬菜消费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人均粮食消费从1980年的148.6千克，下降到1995年的81.6千克，15年减少了67千克，减少幅度达45%。蔬菜消费，1980年为126.2千克，1995年为97.7千克，15年减少28.5千克，减少幅度达22.58%。

“八升”是指主要副食品消费的支出不断增加，包括：鲜乳品和酸奶、家禽、食用植物油、肉类、鲜蛋、鱼虾、酒类以及瓜果等八大类。其中，鲜乳品和酸奶的饮用量，1980年为4.9千克，1995年达到25.2千克，15年增加了5.14倍；家禽食用量，1980年为2.3千克，1995年达到14.4千克，15年增加了6.26倍。其它品种的食用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工农业生产得到持续快速的发展，尤其是“菜篮子工程”的成功实施，与人民群众生活紧密相关的主副食品货源逐渐增多，使得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的主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等生活用品凭票证供应的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初终于逐步被终止。1992年1月28日，市政府决定即日起对食糖、鲜蛋和食盐取消票证。这样，原先紧俏的、限量供应的商品，随着货源的充足，逐步敞开供应了，于是鲜奶、家禽、食用植物油等的消费量直线上升。并且，随着生产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包装副食品进入市场，食品加工业蓬勃发展，自选零售经营的方式得到了大规模的推广。同时，快餐食品、快餐店和各种档次的食品店纷纷出现，引领着上海城市居民家庭吃的消费结构、消费习惯的变化。正是由于吃的东西多了，人民群众肚子里“油水”足了，所以粮食（主食）和蔬菜的消费量就大幅度地下降了。

在进入新世纪以后，上海城市居民家庭吃的开支的结构调整，呈现出新的特点。据统计，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和占总支出比例分别为，2000年人均消费总支出8868元，食品支出3947元，恩格尔系数为44.5%；2002年人均消费总支出10464元，食品支出4120元，恩格尔系数首次低于40%，为39.4%；2007年人均消费总支出17255元，食品支出6125元，恩格尔系数为35.5%。食品支出占总支出比例持续下降，恩格尔系数从40%多下降到30%多，标志着上海人民生活实现了由小康到富裕的跨越。

这个时期，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人均主要食品消费呈现出“一升二降三保持”的态势。

“一升”，是指“在外饮食”增加了。过去，上馆子吃饭是高档消费，与普通市民是“无缘”的。然而现在，上饭店吃饭已经成为寻常百姓家的寻常事。据统计，人均“在外饮食”支出2000年为710元，2007年为1722元，占食品类消费的比重，2000年为17.98%，2007年为28.11%。

“二降”，是指肉禽蛋水产品的消费比例下降了，从2000年的33.54%，下降到2007年的27.2%；同时，粮油的消费比例从2000年的10.03%，下降到2007年的9.15%。

“三保持”是指是指蔬菜；干鲜瓜果；糕点、奶以及奶制品等三个方面消费量，始终保持着比较高的比例。

与上海城市居民一样，上海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食物性支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三降”和“八升”。“三降”，是指粮食（主食）、蔬菜及菜制品、食糖的消费量下降了。其中，主要年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粮食（主食）的消费量，1980年是302.79千克，2007年是158.00千克。2007年与1980年相比，粮食（主食）消费量下降52.18%。“八升”是指油脂类、肉禽及其制品、蛋类及蛋制品、奶及奶制品、水产品、水果及水果制品、卷烟和酒的消费量增加了。

上述数据反映的是：城乡居民吃的东西品种多了，同时吃的观念、吃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吃讲营养、吃讲清淡、吃讲健康了，因而引起了食品消费品种与结构的一系列的“升”与“降”的变化。

三、耐用消费品的升级换代

耐用消费品是指使用寿命较长，可多次使用的消费品。耐用消费品由于购买次数少，价格比较高，需要花费比较长时间的积蓄，因而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和决策比较慎重。目前，耐用消费品的典型适用产品如家用电器、家具、汽车等。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新兴产业的兴起，新型家用耐用消费品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生活习惯、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变迁，耐用消费品不断向高端发展，市民耐用消费品的支出也不断增加。据统计，上海市民“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项目的支出，从1980年的50元，提高到1985年的118元，1990年的196元，1995年的637元，短短15年间增长了10多倍。这反映的是极不平凡的社会发展过程。

20世纪70年代，我国尚处于物质相对匮乏阶段，上海市民对耐用消费品的追求，是以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等“三大件”为代表的，是人们所梦寐以求的，人们将“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看作是富足生活的象征。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每户都有“三大件”仍然难以做到。每百户上海市民的自行车拥有量，1980年只有65辆，1985年也仅为81辆。每百户上海市民的缝纫机拥有量，1980年只有80辆，1985年为93辆。只有手表的拥有量超过户均1块的水平，每百户上海市民的手表拥有量，1980年为252块，1985年达到348块。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等“老三大件”开始淡出，上海市民开始了对“新三大件”的追求，即电视机、洗衣机和双卡录音机。上海市民对“新三大件”之一的电视机的追求，先是黑白的。上海市民每百户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1980年是59台，1985年达到了88台。它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早在1981年7月，上海就对电视机取消了凭票供应，因而使之普及率迅速提高。在黑白电视机有了一定普及的基础上，作为身居大都市的上海市民又开始了彩色电视机的追求，每百户的拥有量1985年已经达到了22.4台。

随着时代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统计局在统计城乡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时，不断地修正，及时停止对一些品种的分类，如手表、收音机和电唱机等，它们或因已经高度普及了，或因产品更新换代已经淘汰了。同时，增加了许多新的统计品种，包括电脑、空调等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的高端耐用消费品。

进入新世纪以后，上海城乡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它不仅用于休闲娱乐，而且用于家庭教育、用于健康投资、交通等方面，以不断提高生活质量。家用轿车首次进入统计快报，具体为：2007年，平均每百户上海城市居民家庭有轿车9辆。并且，城乡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之间的差距，正在迅速地缩小。

四、消费领域不断拓展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领域不断被拓展。交通费用支出、通信费用支出、娱乐教育文化服务费用支出、水电燃料费用支出等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

上海居民家庭交通费用支出，1980年为19元，1990年为37元，1995年为147元，2000年为375元，2007年为2079元。这些数字所反映的事实是：市民的出行方式改变了。改革开放初期，乃至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上海出租汽车业于普通市民无缘，只有部分市民逢喜庆婚丧大事时才偶然使用。所以，20世纪70年代末全市只有121辆营运出租车，到1985年营运出租车辆也只有2033辆。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情况改变了，为了节省时间，出门乘坐出租汽车逐步成为寻常人家的寻常事。这也促进了出租汽车业的大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初，全市就已经有近2万辆营运车辆了。到2007年已有48614辆了。

上海居民家庭人均通信费用支出，1980年和1985年均为1元，1990年为5元，1995年为155元，2000年为384元，2007年为1075元。这些数字所反映的历史发展轨迹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人民群众生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1978年，刚刚文化大革命走出来的上海，经济百业待兴，这时的全市住宅电话拥有量约为千分之三，一直到1985年前，几乎还没有私人住宅电话，于是，人民群众的通讯费用自然就极其低下了。到1993年5月，情况已经大有改观，私人住宅电话拥有量已上升到了18.3%，全市住宅电话的总数已占电话用户总数的60%，市区住宅电话普及率为20%，郊县也已有60多个电话村。[3]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呼机大流行，从数字机到中文机，成为人民群众广泛使用的通信工具。在20世纪末、新世纪初，被人民群众称为“手机”的移动电话大普及，至2007年移动电话户均已超2部，随之而来的是通信费用支出的大幅度增加。

娱乐教育文化服务费支出主要包括：娱乐用耐用消费品、教育、文娱用品、书报杂志和文化娱乐服务等项目。上海居民家庭人均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支出，1980年49元，1985年89元，1990年228元，1995年466元，2000年1228元，2007年2654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为了学习文化技术、掌握知识信息以在职场竞争中把握主动权，都极大地促使市民的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支出不断创出新高。

同时，由于家用电器、燃气器具的不断普及，上海市民的水、电、燃料消耗量以及费用支出逐年大幅度增长。全市自来水售水量，1978年0.02亿立方米，2007年23.9亿立方米。用电量，1978年0.03亿千瓦时，2007年1072.38亿千瓦时。燃气销售总量，1978年0.02亿立方米，2007年18.50亿立方米。上海居民家庭人均水、电、燃料费用支出，其中水费支出，1980年4元，2007年100元，增长25倍。电费支出，1980年4元，2007年379元，增长近95倍。燃料费用支出，1980年9元，2007年173元，增长48倍多。

随着上海人民的生活从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到富裕的跨越，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城乡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改善，市民的平均期望寿命大幅度提高。平均期望寿命1978年为73.35岁，其中男性70.69岁，女性74.78岁；2007年增为81.08岁，其中男性78.87岁，女性83.29岁。30年间提高了7.73岁。

改革开放30年来，上海经济社会能够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人民群众之所以支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因为在这当中，上海切实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体现了发展依靠人民群众，发展的成果让人民群众共享。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来源：《上海改革开放三十年研究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1]董驹翔：《社会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236页。

[2]根据德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恩格尔(1821~1892)的定律确立。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恩格尔系数用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生活富裕程度的指标。指的是一个家庭的全部支出中饮食费用所占的比例。这个比例数字越小，表明生活水平越高。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3]姚锡棠主编：《上海社会十五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3页。

